

“禁令”与赈灾救荒

——以北魏诏书中的禁令为中心考察

王志达

摘要:北魏统治时期,政府为赈灾救荒多次颁行“禁令”,“禁令”可分为“严禁令”与“开禁令”两大类,其内容涉及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开放自然资源与民共享,禁酒,整饬吏治等,这是封建法制和帝王仁德之治的集中表现。北魏政权在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前提下,积极赈灾救荒。

关键词:北魏;禁令;仁德之治;赈灾救荒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5)03-0114-05

禁令作为君主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于一定时期面对特定问题所颁行的较为严厉的法制条文,它是封建法制与帝王仁德之治的集中体现,在封建政权的运行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北魏诏书中与“禁”相关的既有严禁令,又有开禁、弛禁、罢禁令,它们是出于皇帝个人态度和不同时期统治面临的实际问题而颁布施行的,反映着不同时期社会统治需要的变化。通过考察北魏政权运作情况可以发现,禁令的颁行多在灾荒状况发生前后,它们的颁行在一定程度上能成为赈灾救荒的强有力政策措施。

一、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

古代封建社会,农业始终是封建政权统治的根本。北魏政权也毫无例外实施“重农”政策,“农为政首,稷实民先”^{[1](P179)}以此来维护封建政权统治,保障政权运作的财税收入,稳定统治秩序。各朝帝王基于统治实际,多次以发布严禁令与弛禁令的形式,从多方面着手来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发展的手段来赈灾救荒。

(一)保障农业劳动力

基于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现实,封建统治者若要保障获取支撑政权运作的足够赋税

收入,又在灾荒时期稳定社会统治秩序,必须将民众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在一起。不遗余力地推进农业生产发展,那么充足的农业劳动力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保证。

太武帝时期“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1](P109)},该禁令执行的结果是“垦田大为增辟”^{[1](P109)}。太武帝通过禁止民众饮酒,杂耍嬉戏,强制要求民众抛弃经营倒贩事业,以国家严禁令的形式“抑末重农”,不准劳动力做其他影响农业生产的事。这些都是太武帝立足北魏初立塞北平城,国力相对较弱,采取的非常措施,在国家严禁令强制施行下,将更多的劳动力集中于农业生产和土地开辟上来,北魏平城时代的垦田数量突增,北魏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

孝文帝时期通过适度更改刑律“宥刑宽禁”^{[1](P140)},防止“一人为恶,殃及合门”^{[1](P140)}事故的发生,“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1](P140)}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诏“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民多饥窘,轻系之囚,宜速决了,无令薄罪久留狱犴。”^{[1](P163)}在饥荒之年,不因滥刑导致农业劳动力久关于监狱,罪行较轻的犯人尽

王志达,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社会史。

早出狱可为农业生产状况的改善提供一定的劳动力。这些“禁令”一方面体现皇帝仁德之治,另一方面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灾荒时期的农业劳动力不因滥刑而过度受损。

宣武帝永平二年十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1](P209)}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丁兴旺是劳动力充足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兴旺发达的象征。皇帝以严禁令的形式禁止屠杀有孕的人,并形成永远不能改变的制度,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劳动力的来源。

在赈灾救荒过程中,颁行这些禁令是用发展的眼光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灾荒带来的社会问题。既安抚了灾荒中民众的慌乱之心,稳定了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又能充分地将劳动力合理地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保护农业生产资料

北魏统治者在保障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保护。通过一系列禁令来规范农业生产,禁杀牛、马等主要农业生产工具。

孝文帝延兴五年六月庚午,诏“禁杀牛马”^{[1](P141)},虽然该时期国家“州镇十三大饥”^{[1](P141)},因为牛马的生长周期较长,在范围较大的饥荒发生时,百姓会为了起码的生存而杀掉牛马等牲畜来充饥,这样势必会影响灾荒过后的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后续发展,国家下达严禁令禁止杀牛马,这一措施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农业生产工具不受太大的损失。

宣武帝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马之禁。”^{[1](P212)}北魏这一通禁令的施行是相对于宣武帝正始四年十有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马”^{[1](P205)}的严禁令而言。在河南地区实施此类禁令和通禁适北魏与南朝间的关系而定,南北关系紧张时,北魏为了防止作为战略物资的马匹南流,因此,禁止河南地区饲养牝马。在南北关系缓和时,为了自身的军事战略物资的储备和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北魏就通河南地区的牝马之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延昌元年前后,北魏国内水旱灾害频繁发生,饥荒状况严重,并且无法彻底解决。

为了改善统治状况和民众遭受饥荒的生活现实,从而通河南牝马之禁。

孝明帝熙平元年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之禁”^{[1](P224)},面对国内饥谨状况的发生,北魏后期为了加强农业生产和保护农业生产资料,又重新声明严禁杀牛。同一政策在一个王朝前后多次出台,这说明该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佳,即国家的禁令是“禁而不止”。这与北魏时期灾荒的时常发生是有密切关联的,普通百姓面对饥荒,首选的充饥保命,对于国家的此类禁令无暇顾及。统治阶级站在维护政权延续统治的角度下严禁令,而民众的选择却与之相背。此时也可以看出北魏后期政府和民众的阶级矛盾十分突出,北魏政权也在努力地赈灾救荒,以此来延续政权统治。

(三)支持人口流动

孝文帝太和七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饥,诏郡县为粥于路以食之。又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1](P152)}在饥荒发生后,政府要求郡县施粥,并且开放关津隘口,允许饥民自由流动。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诏以肆州之雁门及代郡民饥,开仓赈恤”^{[1](P162)},“六月辛巳,秦州民饥,开仓赈恤。”^{[1](P162)}六月癸未诏“春旱至今,野无青草”^{[1](P162)}七月己丑诏“今年谷不登”^{[1](P162)}。从上述史料可知该年灾荒的严重程度,孝文帝在七月下诏“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开仓赈恤。”^{[1](P162)}这一诏令与传统封建统治限制户口和人口流动的政策相比做出了较大的改变,放松对民众户籍户口限制,允许受灾人口自由流动,这样既可以缓和主要受灾地对灾民赈济不足的压力,又可以使留下来的灾民在所在地获得政府更多的赈济,这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赈灾救荒而做出的权宜之策。

同年十一月丁未,“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1](P163)}孝文帝下达这样的诏令,其原因还是“是岁大饥,诏所在开仓赈恤”^{[1](P163)}通过放松原本为政府服务的技工的人身控制,允许有手艺的技工自谋生路,以此来缓解阶级矛盾,减轻政府赈灾救荒的压力。

二、自然资源“与民共之”

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事关国计民

生的资源之控制都是极为严格的,普遍实行“盐铁官营”的政策以此来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北魏献文帝、孝文帝统治时期,多次放开山泽之禁,开放盐池之禁与民共之。这些法令的施行都与当时国家面临灾荒频发的内部形势和国家实力以及帝王的仁德之治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北魏作为北方草原民族拓跋鲜卑贵族和中原汉族地主共同联合掌控的政权,皇权未真正地达到高度集权,这些“开禁令”的颁行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根据史料可以看出,此类法令颁行前后多有灾荒发生,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安抚统治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不得不放开原本由国家掌控的自然资源与广大灾民共享。但在灾荒形势稍有好转或者国有战事,急需财税补给时,国家又会将国计民生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谋求利益。

献文帝皇兴四年十一月,“诏弛山泽之禁。”^[1](P130)在本年正月,“诏州镇十一民饥,开仓赈恤。”^[1](P130)可见皇兴四年饥荒严重程度。此时,不仅国内发生严重的饥荒,而且周边吐谷浑、蠕蠕等政权对北魏武力威胁,国内时常有动乱发生。北魏通过系列的军事斗争,平息了来自周边的军事威胁,镇压了国内反抗势力。“二月,吐谷浑拾寅不供职贡,诏孙观讨之并大破拾寅,拾寅的从弟豆勿来等率所领降附。”^[1](P130)“八月,群盗入彭城,杀镇将元解愁,长史勒兵灭之。蠕蠕犯塞,帝北伐亲征,大破虏众”,^[1](P130)“十月,诛济南王慕容白曜、高平王李敷”。^[1](P130)

在献文帝平息了内外动荡局面后,为了安顿民生,休养生息发布了“弛山泽之禁”的诏令,将山泽之中所有的资源与民众共享,这可看做是当年“四月辛丑,大赦天下”^[1](P130)的延续。

孝文帝太和六年八月庚子,“罢山泽之禁”^[1](P152),孝文帝朝颁行的诸多诏令与皇帝开明的仁德之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孝文帝统治时期多次大赦天下,颁布诏令要求尊敬老人,照顾鳏寡孤独和贫弱之人。该时期水旱灾害也是频繁发生,民众多有饥荒。在下达“罢山泽之禁”前,他曾“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处,免民租赋,贫俭不自存者,赐以粟帛。”^[1](P151-152)

孝文帝太和七年十二月庚午,“开林虑山禁,与民共之。诏以州镇十三民饥,开仓赈恤。”^[1](P153)开林虑山之禁也是孝文帝出于对赈灾救荒而颁行的,希望通过开放山林资源,使民众能够更好地生存,度过自然灾害带来的大饥荒。

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俭,遣侍臣循察,开仓赈恤。乙丑,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1](P180)盐自古以来都是政府牢牢掌握的财赋利之来源。它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税收来源,在此时期,为了赈灾救荒,孝文帝下令开禁,与民共之,这对改善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孝文帝开盐池之禁这一惠民政策,在宣武帝景明四年七月庚午改变,“诏还收盐池利以入公”^[1](P196)。政令的更改与北魏政府面临的实际统治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之,北魏通过开放资源与民共享来赈灾救荒,这是皇帝仁德之治的表现,这些开放资源与民共之的赈灾救荒的诏令或许只能在国家政权实力相对强盛的时期颁行,它们的实施对民生改善有着积极作用。

三、禁酒

“因靡谷耗粮,为节约粮食,稳定社会秩序”^[2](P71),国家在发生自然灾害和饥荒时,为了保障赈灾救荒有基本的粮食供应,往往颁布严厉的“禁酒令”。政府强制性地禁止酒的生产和销售,不使粮食过多地浪费,可节约更多的粮食以供应灾荒之年的赈灾救荒之用。

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国家四方多事。太武帝时,恭宗监国,曾下诏劝课农桑,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为求得国家稳定,土地增长,曾下令“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1](P109),在皇权强势推动下,农田增量取得显著效果,“垦田大为增辟”^[1](P109)。太武帝通过禁止民众饮酒等举措,一方面为北魏政权的农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源的保证,另一方面又可提供更多的余粮储备,以备灾荒之年的赈灾之用。这一禁酒令为北魏后续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朔,“初设酒禁”^[1](P116)。原因是在太安三年十二月,“以州镇五蝗,民饥,使使者开仓以赈之。”^[1](P116)五

个州镇发生了严重的蝗灾,民众闹饥荒,开仓放赈。故在第二年正月禁酒,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粮食对灾荒发生地区民众的救济。

孝明帝正光后期,“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合米五万三千五百九十九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千九百九十九斤。”^{[1](P2860-2861)}北魏后期统治危机逐渐加重,水旱灾害依然频发,国家的财政用度匮乏。皇帝为了解决相关问题就禁百官饮酒,这样计算下来可以节省巨额的米、孽谷和面。这一禁酒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赈济国内的水旱灾害,安抚怨苦的灾民之心,维持地方统治秩序,从而延续北魏王朝的封建统治。

四、整饬吏治与赈灾救荒并行

国家在储备粮食和赈灾救荒时,不仅仅要考虑安定民生,而且也要密切关注吏治。北魏统治者在此过程中发现了部分吏治败坏的情况,并且以严禁令加以告诫和惩处。广大基层一线官吏作为皇权政令的具体贯彻执行者,他们与身处灾荒中的民众直接接触。吏治不兴,皇权禁令就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等贪污腐败问题就在一线官吏群体中发生。若吏治如此,势必会在社会灾荒动荡时期,进一步激化官民阶级矛盾,使原本赈灾救荒的初衷无法实现。所以在政府的赈灾救荒过程中,应该将整饬吏治与赈灾救荒密切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周边局势动荡,国内旱灾频发。加之,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在此时并不理想。文成帝于太安五年十二月戊申发布诏令“朕承洪业,统御群有,思恢政化,以济兆民。故薄赋敛以实其财,轻徭役以纾其力,欲令百姓修业,人不匮乏。而六镇、云中、高平、二雍、秦州,偏遇灾旱,年谷不收。其遣开仓廩以赈之。有流徙者,谕还桑梓,欲市余他界,为关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曲司之官,分职不均,使上恩不达于下,下民不赡于时,加以重罪,无有攸纵。”^{[1](P118)}

封建皇帝的治国蓝图是好的,但是面对国内

多地遭遇旱灾,百姓遭遇饥荒,国家只好开仓赈济。同时,为了缓解赈灾压力,允许灾民自由流动,积极合理地疏导。在此过程中,统治者以法令的形势对掌管赈灾救荒的官吏进行了告诫,若官吏不能很好地分职尽责,不能使得中央帝王恩令很好地下达贯彻执行,灾民未能得到应有的赈济,就要对官吏施加重罪。可以看出在赈灾救荒过程中,预防官吏不作为及贪腐是十分必要的。

文成帝和平二年正月乙酉,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1](P119)}此时的北魏文成帝清楚的认识到了在征发租赋储备粮食时,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损公肥私,对下层民众的利益造成严重侵害这就是“为政之弊”。官吏、富商获取暴利,普通的民众则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对于此类弊政,文成帝急于凭借一道禁令就彻底地禁绝贪腐这是不现实的,法令的制定颁行有其滞后性的一面。但是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官吏贪腐作风问题的深恶痛绝,对犯罪之人的惩处定罪也是极为严厉的,“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1](P119)}这样的禁令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官吏贪腐和官商勾结的犯罪行为加以遏止,对国家储备粮的征收和政权的稳定有着积极地作用。

孝文帝延兴四年发生过大范围的饥荒,“州镇十三大饥,免民田租,开仓赈之。”^{[1](P141)}延兴五年四月癸未,“诏天下赋调,县专督集,牧守对检送京师,违者免所居官。诏禁畜鹰鹞,开相告之制。”^{[1](P141)}在古代农业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粮食产量极为有限,年景的好坏只能由天决定。一旦国内发生大范围的饥荒,饥荒带来的灾害性影响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孝文帝为了解决灾荒带来的系列问题,除了开仓赈恤外,还对国内掌管赋税租调征收的官吏以法令的形式进行严格的监督约束,禁止官员懈怠渎职,禁止蓄养鹰鹞,严防官吏不务正业,如有违反规定随即免官。这样的诏令不仅可以规范官吏各司其职,责任到人,而且还能使国家赋税和粮食储备有更好地保障。

孝文帝太和元年十二月丁未,“诏以州郡八水旱蝗,民饥,开仓赈恤。”^{[1](P145)}太和二年,“是岁,州镇二十余水旱,民饥,开仓赈恤。”^{[1](P146)}太和之初国内连续发生水旱蝗等灾害,饥民遍野,孝文帝每次都下诏开仓赈恤。

太和二年十一月庚戌,又下诏“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顷以来,遂各怠慢,纵奸纳赂,背公缘私,致令贼盗并兴,侵劫兹甚,奸宄之声屡闻朕听……亦望蕃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复礼,思愆改过,使寡昧无愧于祖宗,百姓见德于当世。有司明为条禁,称朕意焉。”^{[1](P146)}地方官员怠慢于政务,贪污受贿,损公肥私等贪腐行为普遍,导致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孝文帝基于吏治现况并施以仁德之治制定明文条禁,以此来引导规范吏治。

北魏政府在粮食征发储备和赈灾救荒过程中,以“严禁令”的法制形式和帝王仁德之治强化对官吏的监督与吏治问题的整治,最大程度地减少官吏压榨盘剥,官商勾结,损公肥私等不法行

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北魏政府努力地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发展的方式解决灾荒问题。与民共享原本由国家掌控的自然资源,惠及民生,缓和阶级矛盾。强力推行酒禁,既节约粮食,又能稳定社会秩序。在赈灾救荒过程中,国家也注重规范、监督整治吏治,确保有关赈灾救荒的政令能够很好地贯彻执行。北魏政府通过颁行“禁令”来赈灾救荒,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都可视作“封建法制”与“帝王仁德之治”在赈灾救荒的运用。

[参考文献]

- [1](北齐)魏收撰.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黄修明.中国古代酒禁论[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

责任编辑:陈青松